

姚莹《谈艺图》与桐城派的江南传衍

汪孔丰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 自道光十一年七月至十七年十月,姚莹一直在江南做官。他在政事之暇,交游名士,主持风雅。《谈艺图》就是他第二次代理两淮盐运使期间为纪念扬州谈艺韵事而绘制,反映了他与李兆洛、蒋彤、毛岳生、吴德旋、刘宝楠、刘文淇等江南文士谈道论艺的雅集盛况。由此图再联系到他从政江南期间以及仕宦江南前后的文化活动,可发现:姚莹居官江南,与其幕府宾客道艺均进,并表现出汉宋调和之态势以及强烈的重道经世之意识,这也昭示着江南学风与士风的新变。不仅如此,他还有力推动了道光年间桐城派的传衍。总之,这幅《谈艺图》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多重的文化记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思想艺术价值。

关键词: 姚莹;《谈艺图》;桐城派;传衍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6)04-0098-09

嘉庆二十年,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因病在江宁钟山书院去世。此后,桐城古文之学的传衍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姚门弟子肩上。姚莹、陈用光、邓廷桢、姚椿、梅曾亮、康绍镛、吴德旋、方东树等一批姚门弟子尽力传播惜抱文法,有力推动了桐城派的南北流播。而拥有姚门弟子与姚鼐侄孙双重身份的姚莹,对桐城古文的弘道传法之功尤易引人关注。

自道光十一年七月至十七年十月,姚莹一直在江南做官,这是他传扬桐城派的一个重要时期^①。其间,江南文士如李兆洛、毛岳生、吴德旋、包世臣、方东树、潘德舆、梅植之、刘宝楠、刘文淇等纷纷来归。姚莹在政事之暇,与诸子谈道论艺,宾主尽欢。为纪念此等韵事,他还专门嘱人绘成《谈艺图》。本文就以这幅图为研究视窗,阐述其来龙去脉及具体面貌,并详细论述姚莹与谈艺宾

客之间的交际关系及相关活动,进而探究他仕宦江南期间推动桐城派传衍的相关问题。

一、《谈艺图》始末

关于《谈艺图》的创作背景、绘制者以及绘图经过等情况,容易见到的是阳湖通儒李兆洛的弟子蒋彤的记载:

(道光十七年)七月既望,彤与冕之(宋景昌)、冠英(吴儁)随往扬州,住运司署中之景贤楼下。生甫(毛岳生)、仲伦(吴德旋)皆在。公(姚莹)曰:“题襟馆中寂寞二十年,不意复有今日之集!”属冠英绘《谈艺图》记其事。与于此图者曰姚公、曰养一师(李兆洛)、曰仲伦、曰生甫、曰冕之、曰宝应刘楚楨宝楠、冠英及彤也。四农(潘德舆)归山阳,姚公从子师沅已赴省城,虚其位,俟其归而补肖之……是行也,留扬州十日,彤与冕之赴江宁应试。生甫母服

收稿日期:2016-03-21

作者简介:汪孔丰,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家族视域下的桐城派研究”(项目编号:13CZW051);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gxycZD2016202)。

^① 王达敏在《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中对姚莹仕宦江南期间推动桐城派传播的情况有简要阐述,虽未具体展开,但对笔者写作此文颇有启示。本文侧重以《谈艺图》为视角来深入探讨姚莹在江南推动桐城派传衍的情况。兹感谢王达敏先生、安徽师范大学潘务正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指点。

未阙,与先生及冠英于八月下旬离维扬。①

情况极为有价值。全文录之如下:

由此可知:其一,绘制者是画家吴冠英。他是江阴人,“以三绝擅长,写真尤得古法”②。他能侍从李兆洛,殆与李氏长期主讲江阴暨阳书院有关。此次扬州之行,他有幸躬逢盛会,濡毫磨墨,挥写丹青的重任非其莫属。其二,绘制时间是在道光十七年。是年七月十六日,在代理两淮盐运使姚莹的邀请下,李兆洛携其弟子蒋彤、宋景昌、吴冠英一同来到扬州,入住运司署。《谈艺图》就是在此期间所绘。其三,绘图缘由:当时,姚莹幕府内文士云集,宾主相得甚欢,以至于姚莹感叹说:“题襟馆中寂寞二十年,不意复有今日之集。”题襟馆是曾燠所建,他在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十一年任两淮盐运使,其间幕府宾客猬集,盛况空前。姚莹在扬州的谈艺盛会,可谓再现了当年题襟馆内的文采风流。为此,他嘱托画师吴冠英绘图,欲以留存谈艺韵事。其四,图中谈艺嘉宾人数及姓名。从蒋氏所记来看,图中宴集诸公似乎仅有姚莹、李兆洛、吴德旋、毛岳生、宋景昌、刘宝楠、吴冠英、蒋彤等8人。

由于年谱所记扬州之行,是蒋彤在李兆洛去世之后所写,相隔时间较远,故他对画中人物恐难以记全。有学者考证出图中人物还有左石研、张际亮(系当年十月补入)③。至此,《谈艺图》中人物名单似已完整。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谈艺图》现存于安徽省博物馆④,画后有姚莹自撰记文(笔者称之为《谈艺图记》⑤),这对我们了解画卷的具体

道光十七年冬[春]⑥,余再权两淮运使。扬州旧为宾客游宴之所,余所交海内贤哲众矣,又为日稍久,于是见过者盖夥,或下榻斋中,共谈道艺。江阴吴冠英偶善画,乃因而貌之。儿婿辈晨夕侍教,亦与其末。方作图时,下榻最久而去之岭南者,桐城方植之东树;之江宁者,鄱阳陈伯游方海;暂返山阳者,潘四农德舆;甫过之江宁又偕往者,泾包慎伯世臣,仪征刘文淇孟瞻、吴庭颺熙载、王僧保西御、王翼凤句生、吴士榛佩苍,甘泉杨季子亮;数过而返闽者,建宁张亨甫际亮,颇以为憾。及图成,而亨甫来,冠英已去,别倩补之,殊不类,姑存之。图中作小山,山前广数十步。左为二大松,怪石倚之;右为小亭,围以长槛,更两修竹嫩娟,小童烹茶所也。山前横大石几,南面据几高坐者为宜兴吴仲伦德旋;稍东为武进李中耆兆洛;几东西面坐把卷者桐城左石研德慧;几西东面坐而髯者宝山毛生甫岳生;后石研坐而石栏者庐江龙门开;后生甫立者刘生楚桢宝楠,余下坐几南为之主人,亨甫后至,更前置蒲团而盘其膝;去楚桢稍西,有两人执手相顾,颀然者左墓之应午,侧面者余子师沆;立两人后作偶语者,余婿张汇也;新城陈淮生兰弟坐小亭中,倚槛与江都梅生植之蕴生共话;立而听者元和陈生克家叔梁;荫大松下行且回顾者阳湖蒋丹棱彤;缓步与语者江宁[阴]宋勉之景昌也。夫道大矣,艺其末焉,故非道之艺不足贵。诸君子所日谈者,道与艺均进,若徒以诗酒从容,夸宾客之盛,非余道也。桐城石甫姚莹记。杨亮书。

这篇记文蕴含着姚莹在扬州交游的诸多重要信息,兹就其幕宾情况谈两点:其一,他细致描述了《谈艺图》的文本面貌,列举了大量幕宾人物姓

① 蒋彤:《武进李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73页。

② 蒋宝龄撰、蒋蓁生续编:《墨林今话》续编一,民国九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③ 施立业:《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0—151页。

④ 据《安徽省文物志稿》(中册)记载,此画纸本,设色,纵40.3厘米,横164厘米,无款,左下角钤“吴儁”印。张祖翼题签:“桐城姚石甫先生扬州谈艺图”。陶澍题引首“谈艺图”,署“道光丁酉嘉平,石甫老友属书,安化陶澍”。图后有姚莹自撰后记及曾国藩观款,吴汝纶、李鸿章、江云龙、沈曾植、方宗诚等人皆有题跋。此画原本系桐城麻溪姚氏家藏,1954年由姚永概次子姚翁望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文物志编辑室1996年编印,第115页。)笔者曾亲赴博物馆观赏此画,见到题签、印章、陶澍题字。惜相关题跋因画卷两侧裱边卷起,无缘得见。

⑤ 此文不见于姚莹的《东溪文集》《东溪文后集》,此据莫友芝《吴冠英绘姚石甫都转谈艺图横卷》所录。《郎亭书画经眼录》卷四,张剑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0—351页。

⑥ 据施立业《姚莹年谱》,当为“道光十七年春”。因为同年十月,姚莹因升署台湾道而离开扬州,故不可能是“道光十七年冬”。

名。据笔者观画统计,图中人物共有21人。记文中,除5人未说明姓名外^①,其他16人皆可知悉,其中姚莹从子师沆、姚莹之婿张汇、龙门开、左应午、陈淮生、梅植之、陈克家等7人被忽略。其二,姚幕内宾客云集,一些文士当时因故未能绘入《谈艺图》,姚莹在记文中专门有所补述。总而言之,这些都验证了方宗诚在《谈艺图后记》中所说:“图中所列老少十余人,皆一时英俊也。先生自为记,并补叙朋辈之先去扬州不得与列斯图者数人,是足见先生笃友怀旧之情根诸天性。”^②

《谈艺图》是姚莹与江南文士谈艺盛会景观的空间呈现,不仅再现了姚幕内的诗酒风流,也反映出宾主间的亲密融洽。不过,这场以姚莹为中心的文化盛会并未持续太长时间,随着他调离扬州,其幕府内的谈艺风流亦随之烟消云散。

二、姚莹与谈艺宾客

姚莹在江南的文化活动,据其仕宦地,大致可分为武进时期与扬州时期。倘若我们仔细梳理他在这两个时期的文化活动,并深入考察其幕下谈艺文士,就会对《谈艺图》的文化意蕴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 武进时期

道光十一年七月,姚莹奉旨来到江苏,参与开坝倒塘、救灾查赈等政务。次年二月,莅任常州府武进县知县。十三年冬,又调任苏州府元和县知县。他在武进一载有余,疏浚孟渎、得胜、澡港三河,治绩卓异,深得民心。其间又好贤礼士,常州文士多与之交游。其中,李兆洛是阳湖县人,周

济、吴德旋是宜兴县人,泾县包世臣因长期作客常州,也自诩为“常州同党”^③,吴江吴育在嘉庆初就以诸生侨居常州,与李兆洛、董士锡等人交情深厚^④,亦可列入“常州同党”。这些常州文人中,李兆洛年龄最长,于经史、考据、舆地、辞章、天算无不淹通,学问最为渊博精深。以他为代表的常州文人群与姚莹交往,主要文化活动是帮助姚氏校订、刊印书籍。

李兆洛精于校勘,“以梓人自随”^⑤,是编刻书籍的最佳人选。姚莹来武进两个月后,就将家族先辈及个人的著述寄给正在江阴掌教暨阳书院的李兆洛,并请他校正姚鼐的《惜抱轩书录》稿本以及个人诗文集。当时毛岳生、吴育也在书院,遂与李氏一道共主其事。这一年七月,他们就编辑整理出四卷本的《惜抱轩书录》,李、毛二人先后为之作序。次年八月,李、毛、吴三人又在江阴重新整理并刊刻了《东溟文集》六卷、《东溟外集》四卷、《后湘诗集》九卷、《后湘二集》五卷^⑥。

姚莹曾祖姚范的《援鹑堂笔记》重新编校工作也启动于武进县署。此事主要由桐城方东树负责。道光十三年,方氏与弟子苏惇元先后来到了武进,开始编校笔记,“随文究义,汇以部居,检校本书,足得依据,整齐首尾,标叠章句”^⑦,历时两年,终成五十卷本。此外,鄱阳文人陈方海也在县署参与整理书籍工作。他在道光十三年四月编校成姚莹《识小录》后^⑧,又编订笔记中的经部《尚书》内容,区为四卷,仅用两月讫功^⑨。

受姚莹之请,这些嘉宾还纷纷撰写了姚氏家

① 按,吴冠英,蒋彤称《谈艺图》中列其画像,而姚莹《谈艺图记》却并未言明他在画中。笔者观看图像时,注意到这无名的五人,其中,姚莹记文中提到的“小童烹茶所”旁边有三个人,一个是煮水的妇人,两个是准备端茶倒水的童仆。此外,吴德旋身边有一小童;姚莹的前面也站有一人,此人未蓄辫,抱书怀中,似童仆,不应是吴冠英。蒋彤所记应有误。

② 方宗诚:《柏堂遗书·柏堂集余编》卷五,光绪年间桐城方氏志学堂刻本。

③ 包世臣:《答董晋卿书》,《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57页。

④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⑤ 李兆洛:《〈抱经堂诗抄〉序》,《养一斋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⑥ 姚莹:《东溟文集》目录后附李兆洛识语,《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368页。

⑦ 方东树:《援鹑堂笔记目录识语》,姚范《援鹑堂笔记》,《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48册,第404页。

⑧ 姚莹著,黄季耕点校:《识小录》“弁言”,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3页。

⑨ 陈方海:《尚书记叙》,《计有余斋文稿》,《丛书集成初编》本。

族先人的墓铭、碑传。如道光十二年冬,包世臣撰写《清故翰林院编修崇祀乡贤姚君(范)墓碑》;同年,吴德旋撰《姚董坞(范)先生墓表》《姚惜抱(鼎)先生墓表》;毛岳生作《姚先生(鼎)墓志铭》《赠奉直大夫福建台湾知县姚君(斟元)墓志铭》;李兆洛撰《桐城姚氏董坞惜抱两先生传》;方东树撰《书姚惜抱先生墓志后》。这些文章对姚莹的曾祖姚范、从祖姚鼎、祖父姚斟元的道德、学术、辞章扬榷发明,灿然无遗。

还需一提者,是《谈艺图》中的张际亮。他是后补的缺席者,与姚莹的关系如他所说“殆宿缘有独深焉者”^①。早在道光三年,他俩就在福州订交。姚莹仕宦武进时,张氏在道光十二年十月、十三年七月先后两次去探访他^②。张氏有诗云:“姚侯此为政,宾客复多贤。”^③可见,他在姚莹署衙,结识了不少署中宾客。他的到来,也应该会给幕府内的文学活动增光添彩。

概言之,常州是清代的学术文化重镇,人才济济。姚莹居官武进,政事之余,凭借地利之便,与江南文人交游在所难免。他聘请李兆洛等人校勘、刻印家族先人及个人著述,既充分发挥了常州文人深厚精湛的学问优势,又多方展示了姚氏的家学与家族文化。

(二)扬州时期

道光十四年秋,姚莹升任淮南监掣同知,治所在扬州府仪征县。次年十一月,两淮盐运使俞德

渊因病请假两月,姚莹被委派扬州代理其职,这是他首次以监掣同知权盐运使。次年二月,新任盐运使刘万程接印上任,姚莹回到仪征。十七年二月,刘万程因奏销缺额,忧惧自尽,姚莹再次护理运司职。同年十月,他因升署台湾道而离开扬州总署,结束了为官江南之途。

姚莹在扬州期间,依旧礼贤下士,当地诸多文人聚集在其身边。宝应文人刘宝楠有诗称姚莹在扬州:“执法三章约,抡才四行收。”^④前句言其执政严明,后句说他抡才造士。就后者而言,姚莹曾到仪征乐仪书院课士,倡导士子讲求道义、敦重实学。^⑤一些扬州俊彦也确实受过他的赏识和奖掖。如刘文淇有诗说:“鰕生惭滥竽,龙门幸著籍。”^⑥王翼凤亦有诗云:“从来文章遇,感激淋肝脾。”^⑦他们或以见赏于姚莹为幸事,或因文章遇合而感激至深。除了他们外,吴熙载、王西御、吴佩苍、杨亮、梅植之等也都曾造访姚莹幕府。他们宾主之间相互切磋学术、辞章,不仅活跃了幕府内部的文化氛围,也加深了宾主间的浓厚情谊。

《谈艺图记》中提到的山阳潘德舆,在姚莹代理两淮盐运使期间,也曾进入幕府。道光十六年二月,受姚莹之聘,潘德舆携第三子潘亮熙、门人吴昆田前往仪征,教馆于淮南监掣同知署。^⑧姚莹移官扬州后,潘氏亦与同馆诸生徒居运使署中,“坐馆讲肄”^⑨。姚莹与潘德舆朝夕聚处,交流诗艺,他观赏并称赞潘氏所为诗文“精深奥窅,一语

① 张际亮著、王飏校点:《〈谭艺图〉为石甫廉访题即送之官台湾》诗序,《思伯子堂诗文集·诗集》卷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94页。

② 据《〈谭艺图〉为石甫廉访题即送之官台湾》诗序云,张际亮又在道光十四年、十六年、十七年先后三次去江南探访姚莹。尤其是在道光十七年,张氏因礼部试道经扬州,至时已是十月,遗憾缺席谈艺集会。不过,姚莹还是专门请吴冠英补张氏之貌入图。这充分显示出他与张际亮之间交情至深,非同寻常。

③ 《武进夜别姚石甫莹大令陈伯游方海上舍》,《思伯子堂诗文集·诗集》卷十九,第704页。

④ 刘宝楠:《送姚石甫先生兵备台湾》,《宝应刘氏集·刘宝楠集·念楼集》卷九,张连生、秦跃宇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335页。

⑤ 《乐仪书院始由监掣课士状》,《东溪文后集》卷二,第487页。

⑥ 刘文淇:《送姚石甫先生莹观察台湾》,《青溪旧屋文集》卷十一,清光绪九年刻本。

⑦ 王翼凤:《奉送姚石甫先生兵备台湾》,《舍是集》卷七,清道光年间刻本。

⑧ 据朱德慈《潘德舆年谱考略》考证,姚莹《潘四农诗序》所说随潘德舆来扬州的“其子亮弼”有误,实为亮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⑨ 潘德舆著,朱德慈整理:《潘德舆家书与日记·养一斋日记》(外四种)“丁酉(1837)”“致亮弼”(四月初一日),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之造,有耐人百日思者”^①。同年六月,他与潘德舆、毛岳生、吴昆田、张汇、陈克家、潘亮熙、姚澹青等8人还有一次金焦之游^②。七月初,潘德舆携子及弟子返回淮安,故而缺席“谈艺盛宴”。

姚莹先后两次代理两淮盐运使,计时近一年。当他离任赴台时,扬州学人对其依依不舍之情借助于诗歌喷涌而出。刘文淇伤怀感叹:“壮游不获从,离绪无由释。”^③王翼凤彷徨无助:“独有江淮士,孤寒失所依”,“恨无琼瑶报,雨泣聊同挥”。^④刘宝楠期冀姚莹赴台:“从兹鲸浪息,边海靖戈矛。”^⑤此外,王翼凤之兄王西御还被姚莹聘入台湾道幕中,任职书记^⑥。在以后的岁月里,对姚莹与扬州学人双方来说,谈艺盛事只能永久地定格于《谈艺图》中了。

简言之,扬州是清代东南一大都会,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中心,文人墨客、四方贤士多汇集于此。姚莹在扬州期间,凭借其身份、地位和名望,吸引着四方人才尤其是当地文人奔赴其幕下。他鼓扬风雅,与宾客们谈文论艺,奖拔人才。一些俊彦顿生知遇之感,以致景附波属,姚幕由此成为继曾燠幕府之后又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中心。

三、道艺均进与学风新变

《谈艺图》虽以“谈艺”为名,但实际上,姚莹与其幕宾所谈内容并不仅仅涉及“艺”,还牵涉与“艺”紧密关联的“道”。他在《谈艺图记》中说:“夫道大矣,艺其末焉,故非道之艺不足贵。诸君子所日谈者,道与艺均进,若徒以诗酒从容,夸宾客之盛,非余道也。”这段话表明了他对待“道”与“艺”的态度以及幕府内“道与艺均进”的情况。

显然,在道艺观上,姚莹认为“道”为本,“艺”

为末,“非道之艺不足贵”。然而,他所说的“道”与“艺”究竟指什么呢?他为什么会重“道”而薄“艺”呢?弄清这些问题,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姚氏与幕府嘉宾谈艺的实质内涵及其学术文化理念。

“道”与“艺”的关系,在古代文艺思想史上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重要话题。“按照传统观念,‘道’都是指儒家修己治人之道,即封建社会正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而‘艺’(文),则是‘载道’、‘明道’的工具和形式。”^⑦桐城派文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大致如此。姚莹作为桐城派传人和程朱理学尊奉者,其道艺观实际上并无多少新见。如他曾说:“诗文者,艺也,所以为之善者,道也。道与艺合,斯气盛矣。文与六经无二道也,诗之与文尤无二道也。”^⑧“文者,载道以行,舍道以为文,非文也,技耳,技不足传君子。”^⑨“文之至者必近道,非知道者不能为,则文成而道以立。”^⑩这些都表明:在姚莹的思想观念里,“道”具有两种意味,或指本体之道,或指社会政治之道。尤以后者最为明显,它涵括伦理教化、切乎世用等相关内容,作为“艺”的诗文必须要与道紧密结合,即“道与艺合”,不然不足道也。

其实,姚莹在幕府内与宾客“共谈道艺”,看重双方对“道”的交流与认同,而不在乎诗酒风流。他对“道”的致意与固守,既体现了姚氏家学的代际传承,又体现了桐城派重道翼道之传统。他期冀和坚信道学能够挽救世道人心,能够扶持纲常伦纪。他之所以把“道”抬到高位,不仅与嘉道时期严峻的社会现实有关,更与其强烈的经世意识有关。他在姚门弟子中,就以“志在经世”著称于世^⑪。

① 《潘四农诗序》,《东溪文后集》卷九,第569页。

② 毛岳生:《焦山诗录序》,《休复居诗文集·文集》卷一,民国二十五年宝山滕氏影印道光刻本。

③ 《送姚石甫先生莹观察台湾》,《青溪旧屋文集》卷十一。

④ 《奉送姚石甫先生兵备台湾》,《舍是集》卷七。

⑤ 《送姚石甫先生兵备台湾》,《宝应刘氏集·刘宝楠集·念楼集》卷九,第335页。

⑥ 《舍是集》卷七《奉送姚石甫先生兵备台湾》尾句下小注云:“时幕中纳西御舍兄书记。”

⑦ 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⑧ 姚莹:《复杨君论诗文书》,《东溪外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452页。

⑨ 姚莹:《与张阮林论家学书》,《东溪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394页。

⑩ 《赠王拭序》,《东溪文集》卷二,第388页。

⑪ 徐世昌:《姚先生堂》,《惜抱学案》上(附录),《清儒学案》,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607页。

实际上,与姚莹交往的阳湖派、扬州学派成员大多也都有浓厚的经世意识,这是他们志同道合的思想基础。阳湖派的代表人物李兆洛就是一个讲究经世致用的学者,他“于书无不备,而必期其有用也”^①,于兵、农、河、漕、盐、币等现实问题,随事立说,颇有卓见。与姚莹交往的李兆洛弟子为学也是务实致用,如蒋彤亲炙兆洛,主博综而蔑据守,经史实学,颇有根底;江阴宋景昌学问渊博,“兼精天文历算之学”^②;吴育也是饱学之士,精通小学、训诂之学,尝谓为文之事有三,曰理、曰典、曰事,“理足以究天人之际,典通古今之变,事周万物之情。三者备,而后可言文”^③。包世臣亦究心于经世之学,“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也慷慨言之”^④。

扬州学人治学不为凿空之言,实事求是,积极关注现实问题。如刘宝楠,论学不分汉宋,期于明道;他重视运河、淮河等问题,在道光十一年写的《上朱大司空书》中明确表示:“改河漕为湖漕,诚今日第一要务。”^⑤刘文淇,研精古学,“于毛、郑、贾、孔之书及宋元以来通儒解谊博览冥搜,实事求是”^⑥;他还走出书斋,实地考察,写《圩岸公修议》,提出圩岸修葺的解决方案。吴熙载,学书于包世臣,与王翼凤业畴人之学,熟悉天文,梅植之称其“妙擅挾天才”^⑦。梅植之,尝学书于包世臣,博览经史,与刘文淇交情最密。杨亮,学书于包世臣,曾入精熟边疆舆地之学的徐松门下,与乌程沈垚、平定张穆、泰兴陈潮、阳湖董祐诚,“皆谈地学之友也”^⑧。王句生,除师事姚莹外,还曾师事包世臣、李兆洛、黄春谷、江藩、刘宝楠、刘文

淇^⑨,自然与他们声气相通,志趣相投。

姚莹“平居以贾谊、王文成自比,其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⑩,加之他确有经世才干,常州、扬州等地饱学之士纷纷会聚于其幕下,他们各有所长,各有所能,大家相互交流,各有裨益。如潘德輿在扬州订交毛岳生,获益匪浅,潘氏就说他们在扬州期间“朝夕谈论,推动至微”^⑪。当然,就“道艺均进”对姚莹的影响来说,主要表现在文事与政事两方面。就文事而言,一方面是指导求学后进,奖掖拔尖人才;另一方面是自身的诗文创作,在江南期间,他的诗歌创作虽然不多,但奏议、尺牍等实用性文章相对较多,而且其内容大多数与政务有关。就政事来说,他无论是任职淮南监掣同知还是代理两淮盐运使,都要与盐政打交道。实际上,他在任这些职位之前,鲜有对盐政问题的论述。他仕宦江南时,两淮盐政弊病丛生,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盐政问题应该是姚莹幕府内宾主之间的热点话题之一。在这些宾客中间,包世臣、李兆洛、毛岳生、刘宝楠等人对盐法多有研究,尤其是包世臣,于盐政颇有见地,曾协助姚莹的上司两江总督陶澍主持两淮盐政的改革。作为经世派官员,姚莹面对棘手的盐政问题,敢于担当,多方寻求解决之道,撰写了《艄后缉私弁兵饭食船价状》《掘场缉私章程变通状》《变盐法议》《上陶制府淮北溢课融销南引议》《再上陶制府北课融销南引议》等文章,这些议状不仅反映出他作为官的务实干练,也显现出他对盐政问题的深思熟虑。他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洞察盐政弊病,并能提出相关解决之道,其幕府内嘉宾恐怕助益良多。

如上所述,姚莹仕宦江南期间,与当地文人广

① 蒋彤:《养一子述》,《丹棱文钞》卷三,《常州先哲遗书》本。

② 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九,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77页。

③ 吴育:《书震川文录目录后》,《吴山子遗文》,缪荃孙编:《烟画东堂小品》,民国九年江阴缪氏刊本。

④ 赵尔巽:《清史稿》文苑三“包世臣”,第44册,486卷,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471页。

⑤ 《宝应刘氏集·刘宝楠集·念楼集》卷六,第272页。

⑥ 丁晏:《皇清优贡生候选训导刘君墓志铭》,《颐志斋文集》卷十一,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

⑦ 梅蕴生:《熙载句生业畴人之学诗以赠之》,《嵇庵诗集》卷二,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⑧ 徐珂:《清稗类钞》,第八册《著述类》“徐星伯著新疆赋新疆识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757页。

⑨ 《舍是集》自序。

⑩ 方东树:《姚石甫文集序》,《考盘集文录》卷三,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⑪ 潘德輿:《与徐廉峰札》,《养一斋杂稿》,清稿本。转引自《潘德輿年谱考略》,第276页。

泛交游,双方“道与艺均进”,反映了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的深度交流及其相互促进作用。在姚莹幕府内,既有尊崇汉学者,又有信奉宋学者,体现出姚莹一视同仁、汉宋兼容的学术襟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桐城派的开放性、灵活性。这些幕宾没有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而是渐融尊德性与道问学于一体,兼含强烈的忧时意识与经世意识。他们在姚莹的主导下,把臂交谈,既研讨学术辞章,又关注时病秕政。《谈艺图》是他们在姚幕内“和谐共振”的鲜明缩影与重要见证。实际上,幕府内谈艺者身上呈现的汉宋调和之态势以及重道经世之情怀,也充分昭示了道光年间江南士风与学风的新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变化不仅是对另一个学术文化中心——京师的学风与士风变迁的遥相呼应,也是对“四海变秋气”的时代主题默移的积极回应。

四、传扬桐城

从嘉庆季年到咸丰六年梅曾亮谢世为止,桐城派在发展过程中分别围绕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梅曾亮四人,形成了四大传播中心^①。而姚莹这个中心的形成实际上与其仕宦江南有重要关联。这一点可从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来考察。

就纵向层面而言,我们要观照姚莹仕宦江南前后的交游经历。他来江南为官之前,有过游幕广东、为官闽中、客游京师的重要经历。自嘉庆十四年至十九年间,他一直游幕于岭南。六载幕府生涯,虽然他与王蓬壶、宋青城、张维屏、黄培芳、王嘯云、孙秀林等人有交往,但更多的是“怀刺门多羞陆贾,谭经苑令惜虞翻”^②。他写信对张聪威也说:“仆倦游岭外,少师友之助,悄然块处,又得书甚艰,莫由稽考,辗转六年,无所成就。”^③自嘉庆二十一年春至道光元年,姚莹一直在福建平和、龙溪、台湾等地当官。在闽期间,他与当地古文名

家陈寿祺、高澍然、张绅等相友善。虽然他们对姚莹诗文亦有佳评,但更多的是推崇其政治才具,如张绅尝与他纵谈时政,将其与诸葛亮相提并论^④;高澍然称赞姚莹:“私谓如足下者得十数人散布直省为之倡,庶几吏治一新,转弱为强可几而待也。”^⑤可以说,姚氏在闽期间的卓著政绩固然可以彰显其经世才干,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他的文学声望。自道光五年十月至七年三月,姚莹有短暂的京师游宦之行。这期间,新交故旧皆相过从,他们有魏源、龚自珍、汤鹏、张际亮、李宗传、吴嵩梁、邓显鹤、管同、张祥河等人。两载京师生涯,他虽多次参加文人雅集,但并未成为京都文坛的领袖人物,文学影响力有限。自道光十七年十月,姚莹离开江南之后,仕途辗转,历尽艰辛。道光二十三年,他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因保台抗英受诬被逮入狱。赦罪出狱后,他被安排到四川效力任用,任蓬州知州。咸丰帝即位后,擢授湖北武昌盐法道,未赴任,奉旨前往广西赞理军务,旋又被升为广西按察使。咸丰三年,病逝于湖南按察使任上。这一时期,他虽有交游活动,但因政务、军务繁忙,从桐城派扩散之层面来看,影响也不大。

就横向层面而言,我们要考察他仕宦江南期间其他人物对桐城派的影响。自姚鼐去世之后,姚门弟子承担着秉承师说、传扬文法的重任。被姚莹称为“姚门四杰”的刘开、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对桐城派的影响各有不同。这四人中,刘开曾被姚鼐寄望“他日当以古文名家”^⑥,然而他却在道光四年病逝于亳州;管同尝被姚鼐赞为“少年异才”^⑦,但命运多舛,在道光十一年卒于宿迁。由此看来,在道光十二年至十七年间,“姚门四杰”中只有方东树和梅曾亮二人继续恪守和弘扬惜抱家法。方氏在这几年间客居姚莹幕府,以编刻书籍为业,对桐城派的传播影响有限。梅氏虽

① 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217页。

② 光聪谐:《得石甫书感赋》,《稼墨轩诗集》卷四,清道光七年刻本。

③ 《与张阮林论家学书》,《东溪文集》卷三,第394页。

④ 张绅:《书姚石甫〈心清消息图〉后》,《怡亭文集》卷四,清道光十三年留香书屋刻本。

⑤ 高澍然:《抑快轩文钞》上册《与姚石甫书》,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⑥ 《刘孟涂传》,《计有余斋文稿》。

⑦ 姚鼐著,卢坡点校:《惜抱先生尺牍》卷四《与鲍双五》(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在道光十三年入京,并在次年以贵得户部郎中,但至少在道光十八年之前,还未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古文圈子^①。除“姚门四杰”外,陈用光、邓廷桢也是发扬姚氏学说的得力干将。早在嘉庆末姚鼐去世到道光中期梅曾亮进京之前,陈用光大力推动了桐城古文在京师的传播^②。陈氏在道光十三年提督浙江学政,砥砺学风与文风,但两年后就返回京师且不久病逝。因而,他仕宦江南在时间上既没姚莹长久,在文化活动影响上也不及姚氏。邓廷桢对桐城派的推动最为用力时期是在道光六年至十五年^③,这期间他正任安徽巡抚。尤其在道光十年,梅曾亮、管同、汪钧、马沅、方东树、陆继辂、宋翔凤等名士皆聚集幕下^④。邓氏常和他们讲艺于八箴堂,文采风流,焜耀江左。此外,他还留意培植安庆敬敷书院内的士子,“试之日,集诸生于院署,手评其文而面教之”^⑤。应该说,邓氏的这些文化活动的确对传衍桐城派起到积极作用。但从业绩、声势、影响等方面看,他逊于姚莹。

综前所论,我们再次认真审视姚莹仕宦江南的一些活动,会有以下发现:其一,他积极刊刻姚范、姚鼐及个人的著述,不仅有意识地彰显和弘扬了家学与家族文化,同时也加深了江南士人对姚氏学说、桐城文风的认识,从而有力促进了桐城派学术文化的传播。其二,他是文化活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常州、扬州两地诸多文人会聚于他的周围,宾主交游酬唱,谈艺论道,“东南学坛牛耳,一时为桐城派所执”^⑥。由此看来,姚莹居官江南,确实对道光年间桐城派的传衍有重要的贡献。

五、余 论

乾嘉时期,以两淮盐运使之职主持风雅影响较大者先后有卢见曾、曾燠两人。他们幕府内会聚大批文士,雅集唱和之频繁,编刻书籍之丰富,一时极东南人文之盛,对当时的文风与士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道光年间,姚莹在扬州雅好文士,招揽才俊,扶轮大雅,也算是继之而起,再现风流了。相较而论,卢、曾二幕中宾主双方往往以闲适雍容之情致,借助于频繁的诗文酬唱来铺饰盛美;而姚幕则有明显的不同,宾主双方一直忧虑世运人心,致力于黜虚崇实、重道济世、挽危救颓,诗酒雍容反在其次。这种差异亦折射出世运升降与谭艺盛衰、学术隆污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倘若我们把视线往后延伸十余年,姚莹谈艺扬州,这一重要的文化事件更显得别具意味。自姚莹离开扬州数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接着又有太平军兴,东南安定和平之局被枪炮声所打破,兵火连年,生灵涂炭,风雅道丧。多年以后,吴汝纶观赏到《谈艺图》,感触万端,撰记写道:“是后中国多故,封疆大吏无网罗人才之意,贤俊离散,海内无此风流矣。”^⑦其言辞中饱含对风雅消歇的痛惜之意、怅惘之情。可以说,姚幕的谈艺盛会,是大清帝国动乱变局来临之前江南文人雅集的最后余音了。此后的风雅复兴,则要等到曾国藩平定动乱后开府江南了,与前者相比,这又是别有一番新境界了。总之,这幅《谈艺图》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多重的文化记忆,值得我们反复思索与长久回味。

① 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② 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第20页。

③ 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221页。

④ 邓邦述:《邓尚书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5册,第147页。

⑤ 邓邦述:《邓尚书年谱》,第147页。

⑥ 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220页。

⑦ 吴汝纶:《姚公谈艺图记》,《吴汝纶全集·文集》卷二,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97页。

Yao Ying's *A Painting on a Discussion about Art and Literature*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in Southern Yangtze

Wang Kong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Anhui, China)

Abstract: Yao Ying (姚莹) acted as an official in Southern Yangtze (江南) from July of the eleventh year to October of the seventeenth yea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aoguang (道光). He made friends with celebrities and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s of graceful people when he was free from governmental affairs. He had *A Painting on a Discussion about Art and Literature* (《谈艺图》) drawn in memory of his talks about Art and Literature with some well-known Jiangnan scholars in Yangzhou (扬州) during his second term of office as the acting Salt Distribution Commissioner in Huainan (淮南) and Huaibei (淮北). The picture depicted the grand event when he banqueted friends and talked about Art and Literature with such Jiangnan literati as Li zhaolu (李兆洛), Jiang Tong (蒋彤), Mao Yuesheng (毛岳生), Wu Dexuan (吴德旋), Liu Baonan (刘宝楠) and Liu Wenqi (刘文淇). Seeing from this picture and then associating ourselves with his cultural activities before and after he acted as an official in Southern Yangtze, we can find that Yao Ying, together with his friends and aide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t and Literature, which showed their reconciliation between Han studies and Song studies and also their strong sense of respecting Confucian teachings and administering state affairs. It also indicated the new change of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in Jiangnan. Besides, he strongly promo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thought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桐城派)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aoguang. In a word, this painting contains rich connotation of thought and multiple cultural memories, and is of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Key words: Yao Ying (姚莹), *A Painting on a Discussion about Art and Literature* (《谈艺图》), Tongcheng School (桐城派), dissemination

(责任编辑 郑 园)